

第二章 话语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本书将基于中英美三国的主流报刊研究揭示围绕低碳的话语建构。鉴于此，本章将对话语分析（尤其是与媒体有关的话语分析）的批判性方法和非批判性方法做一综述，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内外媒体话语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低碳经济的研究。

第一节 关于话语的定义¹

媒体的新闻报道具有社会性，它是一种社会实践，具有一些复杂的、人为的选择标准，而远非中立地反映社会现实或经验事实（Fowler, 1991）。在过去的30多年里，作为隐含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媒体话语越来越被社会科学领域所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媒体话语？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讨论什么叫做话语。

按照 Foucault 的话语概念，Stubbs (1996: 158) 将话语做了如下定义：话语是指自然出现在使用中的语言实情。它还指经常性出现的措辞和说话的惯用方式，这些经常出现的措辞和说话的惯用方式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并形成了意义的定式。

这些使用中的语言实情包含人类社会活动中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它并非是指单纯的语言形式，而是社会和文化相应的历史的话语实践。话语意义的定式是人文力量和社会力量互相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话语是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并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话语实践。话语又是意义形成的语用过程，Widdowson (2004: 13) 曾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如：首相 (the Prime Minister)、布莱尔先生 (Mr Blair)、我们的托尼 (our

¹ 本节部分内容已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Tony)、布什的哈巴狗 (Bush's poodle)。这些不同的称谓所指同一主体，表明了说话者的态度和身份，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作用于社会实践。

话语构建人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他们赋予一些人以权力，但是，并非所有人都享有这种权力。他们只有在于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所发生的社会互动中才存在，它取决于社会情境、机构、社会结构等因素，这些因素互相作用，生产出特殊的话语体系。比如：一篇题为 *Bogus Asylum Seekers* 的报刊文章，这个特殊的话语事件并非天降之物，它是被社会情境、机构、社会结构所构建出来的，同时它也反作用于社会，比如通过这一特殊的话语能帮助维持其种族主义的地位 (Baker *et al.*, 2016)。

话语并非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话语能够通过反映在说话或文字中那些具有特征的语言痕迹的现象来加以识别。Burr (1995) 在《社会建构概论》一书中指出话语是由意义、隐喻、表征、图像、故事、陈述等要素一起以某种方式对某一事件生产出一个特别的版本，围绕着某个物体、事件、人等等也许会有不同的话语，各自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话语的表征方式也不尽相同。Sunderland (2004: 34–40) 分析了英国《兰卡斯特卫报》一则题为 “Tie the knot at Leighton Hall—A dream wedding” (在雷顿厅结婚—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的报道，报道称位于兰卡郡的古老房子 Leighton Hall 获得举办婚礼许可证，Sunderland 发现这则报道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话语，比如 “促销话语”，因为这则报道就像是一则广告向人们通告了一个消息。报道中同时还包含着 “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一天” 话语，所使用的语言围绕着新娘在婚礼这一天的感受 (以新郎为陪衬)。文中还隐含了 “法定异性婚姻” 的话语。这些话语反映和描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同时也有助于构成或传递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反映的是异性婚姻是唯一合法的价值观。

Sinclair (2004) 从衔接和连贯的角度将话语置于篇章结构中，Teubert (2007) 将话语定义为一个话语群体所有的言语，这个话语群体包括所有通过他们的言语对全球话语已经贡献或正在贡献的人，而 Stubbs (2007: 145) 认为话语是有目的、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它无法缩小人们的行为，也掩盖不了文本中的轨迹。后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话语研究不是为了发现真实的世界，而是为了发现真实的世界是怎样被言说的 (Teubert, 2005: 3)。

然而，对话语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阐释性的，也是主观的。例如，

Qian (2010: 19) 在对媒体中的恐怖主义话语分析时, 将围绕着恐怖主义的其他话语类别也归于其中, 比如“二战话语”“合作话语”“反恐之战话语”等。话语这个概念有时用来指语言使用或话题的特殊形式, 比如政治话语、殖民话语、媒体话语、环境话语等等 Baker (2006: 3)。本研究讨论的媒体话语是指媒体的题材, 即在媒体中的书面形式以及围绕着这些书面形式的社会实践(比如: 作者是谁? 读者是谁? 文章写作过程有什么特殊的限制? 这篇文章和另外的文章是否相关联?)。

Bell (1991: 64) 在对新闻故事的话语结构分析时指出故事是人性的核心。人们讲故事的方法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将什么内容选入故事是新闻媒体的关键问题。人们从新闻故事里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媒体使用语言的方式有其特殊性, 媒体的传播是通过操纵语言来实现, 语言反映媒体的结构和价值取向, 媒体语言通过它呈现人或事的方式帮助形成公众态度和意见 (Bell, 1998: 4)。媒体语言的多种特质越来越多地被社会科学领域关注和研究, 人们将之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渠道, 用不同的视角解读媒体话语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以及语言、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媒体话语研究方法

媒体话语研究方法林林总总, 本书将他们分为批判性方法与非批判性方法。批判话语分析将话语作为更广泛的含义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话语不仅仅是一组句子, 一篇文本或者是一组文本, 它同时还是一种实践: 是在一组文本或者是更大范围内的社区所使用语言的特征所在。话语不仅是人们谈论某事的方式, 而且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语言, 批判话语分析家旨在揭示一个群体怎样将自己、社会环境、他者、以及和他们相关的问题概念化。因此, 批判话语分析具有完完全全的社会政治属性, 具有一个鲜明的政治立场(通常是左翼倾向), 从不间断地关照社会中的权力关系, 尤其是那些弱势的群体 (McEnery & Hardie, 2012)。非批判性方法则包括社会语言学方法、会话分析法、结构方法、系统功能方法、语用方法、认知法等。

一、批判性方法

(一) 批判语言学

“批判”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当人们做研究时重点放在自身的反思，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将它们嵌入到社会中，并使它们潜在的立场清晰化 (Wodak, 2001: 9)。批判语言学 (又名批评语言学) 基于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由东安格利亚大学 Fowler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而来。媒体话语是其主要的关注点之一。Fowler (1991: 4) 认为“语言并非中性而是具有高度建设性的媒介”。新闻用语言来反映这个世界，因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构建了价值观、社会和经济本质的结构。批判语言学的框架强调文本的多种功能性质。结合 Halliday 语言的意念功能、交际功能和篇章功能理念，Fairclough (1995: 17-25) 指出“代表性、关系和身份等因素总是共现于每个语篇”，它通过词汇、语法等的选择呈现出来。

批判语言学 (CL) 和批判话语分析 (CDA) 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承认语言的社会属性，因此也都将自然发生的语篇作为研究对象而反对使用 Chomsky 所提倡的“直觉性数据”或“诱导数据”(唐丽萍, 2016: 44)。但他们也有重要的区别，Fairclough (1992: 28) 指出 CL 太过于强调文本而不注重文本产生及解读文本的产生过程，而且 CL 只考察在现行社会关系和结构的社会再现中话语的影响而没有将话语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变革之因素。语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意义也不被 CL 重视。然而 CDA 注重文本和社会情境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CDA 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揭示显现在语言中的权势、不公平、权力、控制的透明和不透明结构关系 (1992: 204)。CDA 的焦点在于分析语言、话语、言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交织关系，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对语言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追溯其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在 Fairclough 于 1989 年发表的《语言和权力》一书中找到线索，该书被认为是批判话语分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书中将话语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深刻阐述了现代英国社会语言使用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二) 批判话语研究

批判话语分析（又名批评话语分析）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引起语言学及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的关注。应用语言学越来越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感兴趣，尤其是语言在构成和传递有关世界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假想的作用，以及语言在维护或挑战现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在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 Billig、Chilton、Fairclough、Kress、Schaffner、van Dijk、Wetherell、van Leeuwen 和 Wodak 等人的带领下，CDA 的研究成绩斐然。1991 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Van Dijk 组织的为时两天的研讨会，有 Norman Fairclough、Gunter Kress、Theo van Leeuwen、Teun van Dijk 和 Ruth Wodak 出席，这次研讨会是批判话语分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的会议。因为从这次会议之后在批判话语不同的流派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CDA 有其政治动机，研究人员清楚自己的职责。Chouliaraki 和 Fairclough (1999: 74) 在讨论 CDA 时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成为批判社会理论家们的共同标尺”，CDA 将语言和社会联系起来，用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理论来揭示语言中隐含的意义。CDA 旨在研究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它视话语为一种社会实践，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建构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知识和信念体系。研究者认为，对于世界的任何表述都是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文本中的意义之争就是社会中的权力之争。因此，“批评话语分析不是单纯对文本进行客观描述，而是通过这种描述揭示文本中隐含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意义”（田海龙，2009: 65）。他们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公开表明自己的动机是帮助被统治与被压迫群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促使社会变革。Van Dijk (1993: 253) 指出，任何批判本质上预设着价值评判标准，批判话语分析家必须是社会活动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 van Dijk 创办的 *Discourse and Society* 刊物的诞生以及系列批判话语书籍的出版，标志着批判话语研究网络的形成。关于批判话语分析是方法还是仅为视角，学界展开过讨论，van Dijk (2013) 认为批判话语分析 (CDA) 不是一种方法，它不可用于系统、清晰、细致、可复制的批评性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它与话语分析以及语言学的其他方向、心理学或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具有各种不同的理论、

方法、分析和应用。基于以上的理由，他建议将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改为批判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缩写为CDS），并被学界所采纳。2016年Ruth Wodak和Michael Meyer主编的*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一书第三版出版时将前两版的书名*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更改。

批判话语研究根植于修辞学、篇章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以及语用学（Wodak & Meyer, 2016: 2）。尽管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方法与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但是符号学、语用学、心理社会语言学、言语民俗学、会话分析、话语研究的部分新领域、新范式、新的语言学分支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在研究话语中有以下七个共同之处（Wodak & Meyer, 2016: 2; Angermuller *et al.*, 2014）：

- ①对生活中自然发生的语言感兴趣，而非抽象的语言系统以及编造的例句；
- ②聚焦更广的语境，而非割裂的字句；
- ③将研究拓展至于句子语法之上，如行为或互动研究；
- ④将研究拓展至非语言形式，如：符号、多模态、视觉；
- ⑤聚焦动态社会认知或互动迁移及策略；
- ⑥研究使用中语言的功能；
- ⑦研究大量语言使用以及篇章语法现象，如：衔接、回指、话题、宏观结构、言语行为、互动、话轮、标记、礼貌、论点、修辞、心智模型以及许多篇章和话语等。

与其他传统话语分析、篇章语言学研究方法不同，批判话语研究不仅研究话语、篇章本身，而且重视话语实践过程及其社会语境分析，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方面来寻找解释话语的原因。话语活动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产生于社会团体与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互动之中。因此，如果我们想理解话语及其效果，就不能不考虑话语出现的语境。“话语的生成离不开语境，不考虑语境就无法理解话语……只有我们考虑到话语使用的具体情景，只有了解了其背后的惯例和规则，只有认识到它们内嵌于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知道话语与过去的什么相联系，话语才有意义”（Fairclough & Wodak, 1997: 276）。正因为如此，

长期以来 CDA 一直以定性研究为主。它的创始人之一 Fowler (1991: 68) 就曾说，批判性的解读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知识与敏感性，人类而不是机器才可以拥有它们。

这种定性研究方法因偏重主观性和缺乏代表性而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Stubbs (1997: 106) 认为，CDA 的材料十分有限，几乎没有考虑过局限于短小语料片段的分析是否充足，应该如何筛选语料，语料是否有代表性，对语料片段的分析没有任何关于其代表性的说明。Widdowson (1995: 169) 也对语料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从特定视角所作的阐释有些偏颇。因为它带有意识形态倾向，选择分析的是语篇中能够支持观点的那些特征。为了回应这一质疑，20 世纪 90 年代末，一种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研究新模式开始出现。批判话语研究不应局限于对文本片段的分析，而应在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关于典型的语言使用情况的一般性结论 (Stubbs, 1997: 109)。

Fairclough (1989: 24) 将 CDA 的研究分为 3 个层面，即文本特征的描述 (description)、话语实践的解读 (interpretation) 和社会实践的阐释 (explanation)。这三个层面包括对文本作为产出结果及作为阐释过程的源点进行分析，同时还对文本间和社会情境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将语言和社会大情境结合的方法在 CDA 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大部分批判话语研究者赞同哈贝马斯的观点，认为语言也是控制和社会力量的载体，即：语言使组织权力关系合法化。根据 Bhaskar 的批判理论，Fairclough (2001: 125) 提出了批判话语的研究框架。首先聚焦一个社会问题，通过分析问题所处的社会实践网络、语言符号系统、与其他处于特殊社会实践诸成分之间的关系、话语等以查明缘由并加以解决。同时还进行结构分析，如：话语秩序、互动分析、互文分析、语言学和符号学分析。考察社会话语实践秩序是否‘需要’这个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批判性地反思整个分析。

与 Fairclough 的分析框架相比，Wodak (2001) 的话语历史分析方法更强调历史情境的分析。话语历史分析方法的特点在于其立足大量各种不同的经验数据和背景资料，跨学科和多方法并存。分析框架主要有以下内容：话语的内部即时语境 (the immediate, language or text internal context)；对言语、文本、语类及话语之间的互文关系分析；超语言的社

会情景语境 (context of situation) 以及与研究话语产生有联系、话语实践所扎根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 (socio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Wodak, 1995)。

纵观批判话语这些分析框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弱点。Blommaert (2005) 曾批评 CDA 过于强调语言和篇章的分析，特别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他还指出单靠分析单个文本以解决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分析框架大都基于对当代社会的分析，很少有历史感。CDA 总是从特殊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是这种方法潜在的弊端。

Stubbs (1996: 82) 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他认为批判话语分析只针对一个篇幅不大的文本的片段，文本的代表性存在着问题。他建议通过使用能提供语言使用的可靠规则的大型语料库来支持 CDA 的研究。利用语料库的方法来大规模考证使用中的语言，支持研究者的直觉推论，使结果更加可靠（关于语料库的方法将在下一篇中详细论述）。Baker (2006: 12) 也建议通过使用大型语料库，将那些不断重复的特殊语言实情中的话语正确地辨别出来，将之作为“话语的增量效应”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discourse”)。语料库数据至关重要，为 CDA 的阐释提供了切入点。并用 CDA 理论来解释语料库中反映的这些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现象。

毋庸置疑，CDA 的分析框架为话语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它总是将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相结合。CDA 研究人员对作为蕴含话语的机构之媒介情有独钟 (Bell, 1998: 6)。Fairclough (1989: 54) 指出新闻报道和其他新闻形式反映了媒体话语背后的权力、地位和其他权势阶层的关系。单个语篇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通过不断重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将读者框定在自己为其设置的话语框架中，以此来行使它的权力。

在批判话语研究的学者中，van Dijk 是一致公认的领军人物，他是跨学科、多方法、文本和社会情境相结合的倡导者。他倡导对语言使用和传播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认知过程中话语的各种背景进行分析。他还关注新闻的特殊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大众传媒中的作用。他用 CDA 的研究框架思考社会功能、认知结构、话语表达和话语再生等命题。在《新闻分析》(News Analysis) 一书中，van Dijk 指出新闻报道，无论是报纸或电视都构成特殊的话语类别。他提出了报纸新闻的研究框架。他的 *News as Discourse* (1988) 和 *News Analysis* (1988) 被认为是媒体话语研

究具有开拓性的论著，它们为媒体话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 Halliday 的功能框架以及 Foucault 的话语理论，Fairclough 从语言、话语和社会权力诸因素，开拓了自己的媒体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他早期的著名论著 *Language and Power* (1989) 和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995) 揭示了语言在产生、维护社会权力关系变迁中的重要性。*Media Discourse* (1995) 聚焦媒体篇章和社会情境揭示当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过程。

与 van Dijk 的研究框架相比，Fairclough (1995: 57) 的框架有三个明显的不同的维度，他将这三个维度称之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文本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广播），言语和图像（电视），话语实践指的是文本产生和消费过程。这些成分围绕着文本产出的过程中提出诸如作者是谁、为什么而写、编者的决定如何做出、新闻审查的内容是什么等问题。同时也关注消费信息，如谁是这些文本的消费者？他们的反应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消费这些文本？是免费还是付费？Fairclough 还倡导在分析文本时要考虑互文性，考察分析的文本中涉及的其他文本以及其他文本与该文本的关联性。因此，就像考察文本自身一样，Fairclough 建议 CDA 还要考查文本与文本产生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分析话语实践时，Fairclough 特别强调对两个影响媒体话语变化的趋势，即市场化（或称商业化）和口语化。

除了 van Dijk 和 Fairclough，Scollon (1998) 也提出了媒体语言和 CDA 相结合的分析框架。他将话语看成是一种社会互动，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商务电话及其他对话是在同一规则下的社会互动。他用社会互动视角特别是人类学方法来研究话语，认为人类学的 4 个最基本的元素是：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亲身体验以及比较性观察。

以上提到的几个话语分析框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van Dijk 更多地从认知学的角度去研究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过程，Fairclough 则更偏重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文本与文本产生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 Scollon 却从人类学的研究角度去关注话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些分析框架在话语研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上文提到的 Stubbs 对批判话语分析的建设性批评，批判话语分析总是定格在单个语篇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利用语料库的方法来大规模考证使

用中的语言，支持研究者的直觉推论，使结果更加可靠。

二、非批判性方法

和种类繁多的话语形式一样，用于媒体话语研究的框架和方法除上文提到的批判语言学及批判话语分析以外还有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方法、会话分析、符号学分析、结构分析法、认知方法、功能方法、语用方法、社会符号学及文化语类分析等非批判性的方法。以下将侧重讨论社会语言学方法、会话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系统功能分析方法、语用分析方法、认知分析方法等。

（一）社会语言学方法

社会语言学对媒体话语的关注点在于文体与社会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他们关注的是媒体话语的特征和这种话语受众或者读者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存在的相关度有多少。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的典型代表有 Bell (1991)、Jucker (1986)。他们共同发现报纸对读者的定位决定了报纸使用的语言风格。比如那些定位中产阶级以上读者的报纸，如：《泰晤士报》《卫报》等比起面向工人阶级的《每日镜报》和《太阳报》要去掉更多的限定词，也就是说，报纸的语言风格因读者而异 (Bednarek & Caple, 2012)。Bell (1991) 在新西兰做了大量广播语言特征的调查，Conboy (2006) 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做了一个历时的新闻语言的研究。

（二）会话分析法

会话分析方法基于传统的会话分析，主要包括对会话结构、会话策略、会话风格 (Conversational Style) 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说话者之间的互动分析。就媒体话语而言，许多学者诸如 Greatbatch (1998) 以及 Clayman & Heritage (2002) 曾经做过新闻采访互动的语境研究，他们发现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的新闻采访都是对抗性和客观性的混合体，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语言特征包括问题设计观察到这种混合体。也有另外一些学者采纳了不同的语言学传统来分析新闻采访，比如 Bell & van Leenwen (1994)。

(三) 结构分析方法

分析媒体话语结构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侧重音韵、形态、句法或单词语义结构、词群或句子结构以及生成语言学的描述，有的却进行更复杂、更高层次的研究，比如句子衔接、整体主题、图示化形式、文体风格及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为了遵守一定的话语规则，结构分析法着重对结构的描述，如寻求衔接和叙事的结构。受 Firth 的影响，Harris (1952) 提出了这种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对叙事体的分析 (van Dijk, 1988)。许多学者对新闻故事、电影剧本及神话都做过语言结构的描述。

运用这一方法的学者们将话语看作是按一定次序排列的系列句子。基于这样的假设，他们在分析语言时关注其成分、在话语中的顺序以及这些语言形式怎样构建成大框架。Van Dijk 是这一方法的倡导者。他提出了一种话语语法分析模式。他深信语义和语用中存在着话语的宏观结构或称超结构。这些超结构可在许多文体中发现，如叙事文、议论文、科技文章及新闻报道等。用于话语分析的结构分析方法在欧洲和美洲的拉丁文国家最具影响力 (van Dijk, 1988)。

(四) 系统功能方法

和结构法相比，系统功能法是另一个引起语言学家们关注的趋势。这种方法采纳了两种理念，其一是社会文化/功能理念，另一个是纯文本理念。一些英国的媒体话语研究侧重文化研究，他们和当代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媒体文体如访谈或谈话节目的文化和社会轨迹 (Montgomery, 1990; Tolson, 1990)。这种方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关注文本的即兴互动及呈现 (见 van Leeuwen, 1993)，如：Goffman (1981) 以韩理德式文本分析多重功能的视角对电台播音员与听众的互动中所呈现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

区别于既抽象又脱离上下文结构的生成语法，系统功能法提出了更趋向语言使用及社会情境的实证性研究 (Giglioli, 1972)。将话语作为社会文化情境互动过程的产物，功能法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它不仅关注句子、表达、形式和意义，而且还关注相关的文化和社会因素。Halliday (1970) 对社会结构中的语言结构作过详尽的阐释，他指出：语言服务于我们的需求，它的功能对于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由语言语法体系构成的

特殊形式和它服务的社会及个人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种方法将说话者看成是个体，同时也视之为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他们使用语言不仅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且还介入一定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事件。当大部分话语研究着眼于形式、意义、交际行为和认知，社会文化方法关注社会身份（阶层、性别、信仰等）的影响。以 Ervin-Tripp (1969) 和 Labov (1972) 为代表，这种方法注重文体差异以及不同的话语类型，如：家长-孩子话语、日常故事、年轻黑人的舌战等 (Van Dijk, 1988)。话语与社会情境的关系是动态的：话语影响并改变社会情境，社会情境反过来限制话语。

由 Halliday 和 Hasan (1976) 发展而来的话语分析方法强调语言的次序、整体文本的切分、语音和句法结构以及根据句子在话语中的位置与功能的语意解读。在美国也有类似的观点。自此，语言学家开始研究语义结构，如：衔接符号、语义衔接、信息结构、主题及韵律 (Fowler, 1991)。

（五）语用方法

语用方法有两个主要的趋势：一是会话分析，另一个是言语行动理论。会话分析方法是由一批社会学家发展而成，20世纪70年代，在各种解释学和现象学的大背景下，一些语言学家开始利用这些方法来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 (Garfinkel, 1967)。不久，这个框架引起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最频繁的互动形式即会话的兴趣。Sacks、Schegloff 和 Jefferson (1974) 等人率先对录音资料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旨在揭示控制社会交际的规则。该项研究从调查日常谈话的规则和理解着手。最初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侧重话轮，之后很快被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以及话语分析等领域所采纳。此外，该方法还被用于分析非正式的会话以及各种会话互动，如：医生和病人话语、课堂话语、会议、招聘面试及访谈等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Labov & Fanshel, 1997; Mehan, 1979; van Dijk, 1985; Atkinson & Heritage, 1984; McLaughlin, 1984)。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 Austin (1962), Searle (1969) 以及 Grice (1968) 发起的另一种语用方法。他们提供了语言使用的语用基本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将作为语言主体的言语和社会行动中的实践联系起来。这一方法连接了语言结构和社会行为，它符合话语分析中将话语看成是言语行动的结果以及语篇与社会情境密切相关的理念 (van Dijk, 1985)。

(六) 认知法

新闻话语认知分析最基本的方法包括新闻呈现和记忆表现的互动，其特点是策略灵活、目标明确、社会情境动态化 (van Dijk & Kintsch, 1983)。这一方法强调话语的产出和解读，解读在思想过程中以及思想呈现中认知的作用。只有生活在同一言语群体，拥有同样的法律、价值观及交际规则，人们才可以正常交流。然而，共享相似经历的不同语言使用者有着同样的社会和文化知识而生成出各种各样的言语。因此这种方法下的话语分析目标是每个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以及整个社会和文化认知。换言之，它非常重视说话者或写作者的生产话语的动态过程以及听者和读者对话语的解读。解读、储存记忆的呈现、文本信息的再生产是诸多分析研究中主要的过程 (同上)。当它用于媒体话语研究时，主要目的是全面展示社会关系和社会产生过程的研究，通过微观层面的日常话语实践以及文本、文本生产过程、文本解读，将这些因素与更广泛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Fairclough, 1995)。Van Dijk 将新闻结构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前者指文本的总体内容即“主体结构”以及文本的总体形式即“图式结构”。

第三节 中国的话语研究

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西方被陆续引入中国，一些话语研究的翻译及介绍性的文章开始零星刊登在汉语语言学刊物上，直到 80 年代末，出现许多话语研究的论文集以及专著，这些研究跳出了传统的语言本体研究，如：《话语语言学论文集》(王福祥、白春仁, 1989)、《新闻语言学》(李元授、白丁, 2001)、《廖秋忠文集》(廖秋忠, 1992)、《语言·语篇·语境》(朱永生, 1993) 等。

在大众传媒领域大部分研究都是纯粹从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理论出发研究新闻生产过程，新闻对读者或者受众的影响，媒体与社会或者媒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汉语新闻和其他语言的新闻对比研究，比如姚里

军 (2002) 的《中西新闻写作比较》，介绍了中西方新闻职能上的不同定位，以及价值取向上不同的主体依据、题材表达上的主客差异、表达方法上的层次区别等内容。然而，这些研究都将大众传媒研究与话语研究隔离开来，他们绕开语言的层面直接切入社会语境，忽略了语言层面上的内在联系 (林兴仁, 1994; 李元授, 1994; 谭细心, 1990)。其中有些研究是词汇、句法以及文本层面报刊新闻标题、新闻要览以及新闻文本主题的问题特征调查 (杨雪燕, 2001; 廖巧云, 1999); 新闻结构 (赵建成, 1994; 曹红霞, 2000) 以及新闻文本各个层面的新闻语类分析 (秦秀白, 1997)，这些文章中，大都用了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分析框架。

如上所述，一些研究用了话语分析的方法，但鲜有批判话语的视角。批判话语分析的出现打开了中国话语研究的新视野，陈中竺 (1995a) 首次撰文介绍批判语言学，提到了批判话语分析的概念。他介绍了批判语言学的哲学、语言学基础，同时也介绍了语言、语篇、语境及意识形态所持的观点以及常用的分析工具，并对批判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做了系统的回顾。同年陈中竺 (1995b) 在《外国语》上发表了题为“语篇与意识形态：批评性语篇分析”，文中对两条罢工新闻进行了分析。陈中竺将 CDA 翻译成“批评性语篇”，他首次将 CDA 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具体的新闻文本的分析中。一年之后辛斌 (1996) 发表“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一文，以两篇新闻报道为例，阐述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语言运用，语言又如何被控制传播媒体的权力阶层用来传播以及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1998 年辛斌再发一文“新闻语篇转述引语的批评性分析”，发现引文语篇中的转述引语貌似客观公正，实际上报道者往往以各种方式介入其中，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 (1998: 14)。陈中竺和辛斌对中国的新闻语篇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强调英语语篇分析中的诸如及物性与情态性的特点分析。继他们之后，其他的一些研究者也开始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视角，有些对该方法进行介绍性的评述，有些在介绍理论后，做一些示范性的分析，试图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揭示通过多种形式隐含在新闻语篇中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他们主要通过分析现行语篇中的词汇 (包括所指 deixis)、句法结构、及物、情态、归类、转换。新闻的分类主要包括政治现实、种族关系、性别歧视等 (辛斌, 2000)。虽然这些分析都发表在中国，但是他们分析的文本均为英语新闻而非汉语新闻。Wu (2002)

基于 Toulmin 的论点分析框架分析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将江泽民的讲话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教育改革话语，另一条是意识形态话语。他发现政治结构貌似专制，但理性上融入了中华文化话语，强调不同群体的稳定、和谐关系。

近 10 多年来，话语研究方法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我们可以看出，话语分析的文章数量处于逐渐上升的趋势，话语研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从文章的类型看大致可分为引进介绍型、理论探讨型、理论与运用结合型。从学科分布而言，分别有：语言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可以看出，话语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平台，连接了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近年来也有相关论著运用话语研究的视角。在此，我们简要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英国报刊中的中医话语研究》(钱毓芳、Tony McEnergy, 2017) 以英国 16 份全国发行的报刊 30 年间围绕中医的报道为基础，纵向考察不同时期英国报刊对中医话语的建构以及变化。研究发现，尽管怀疑的声音贯穿 30 年的报道，但是，这些报刊围绕中医制定的议程是传授中医知识、加深读者对中医问题的理解、塑造中医舆论的重要因素，为中医文化“走出去”以及“走进去”产生积极影响。

《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中美国家身份》(方芳, 2015) 以中美两个大国对恐怖主义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探索有关恐怖主义的媒体话语与媒体所属国的国家身份之间存在的规律性的关系，从国家身份的视角阐释不同国家的媒体进行安全建构时的话语特点差异。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刘涛, 2012)，将环境传播划分为九大研究范畴，致力于从话语、修辞与政治的复合视角探讨环境传播的诸多学术命题，如环境话语争夺的权力运作机制、公共议题构造的符号修辞机制、“反话语空间”的生产机制、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社会资本与生态公民身份的建构机制、话语事件与图像政治的视觉修辞机制等。

《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疫病防治话语的变迁》(张自力, 2008) 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次重大的疫病流行事件为样本，通过与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轨迹相结合、以话语分析方法为手段，对清末民初 1894 年的粤港鼠疫、1910 年的东北鼠疫；民国时期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霍乱、30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 50 年代初的反

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1988年的上海甲肝以及2003年的“非典”事件等，进行了不同于以往公共卫生视角的全新解读。

《新媒体事件的框架建构与话语分析》（吴世文，2014）基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考察新媒体事件，以问题为指引，跳脱出以传播技术为导向的传统线性模式，进而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人（行动者）-新媒体-社会”的研究模式，遵循“行动-事件”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路径，采用“事件-过程”“行动-话语”的分析视角，既从总体上对新媒体事件展开基础性理论研究，又以“公权滥用诱致型新媒体事件”为例，聚焦揭示公权滥用诱致型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建构过程，剖析事件行动者的行为模式，探讨公权滥用诱致型新媒体事件的双重社会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传播学的角度为解决事件及其指向的问题提供导引。最后，本研究对新媒体事件理论进行探讨，致力于将对个案和现象的讨论上升至理论层面，并力图与传统媒体事件理论展开对话，丰富和发展媒体事件理论。

《民生活语与权力博弈：住房改革报道研究》（刘丹凌，2014）将住房体制改革报道作为中国传媒实践当中一个典型而意义深远的“样本”，认为房体制改革本身的民生价值以及房改报道对现实生活的建构和干预功能将这个问题推入了我们的研究视域。新闻话语理论为我们审视和分析房改报道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及方法，使我们得以超越单纯的量化研究和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之局限，将重点从房改报道的文本解读、分析转向新闻话语分析。其中，房改报道的生产、传播、接受（阐释和理解）被视为一个动态实例过程，以反观报道结构与社会实践、报道意识形态的直接关联以及与新闻媒体的机构化环境、宏观社会环境的间接关联。

《恋影年华——全球视野中的话语景观（大陆香港台湾青年电影导演创作与传播）》（钱春莲、邱宝林，2014）聚焦新世纪中国青年导演群体，纵轴上以2000—2011年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大陆、香港与台湾为论述空间，力图打破单一化的研究视角，以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辩证思路出发，建立起宏观统一的华语电影视野，深入透析三地电影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消费文化夹击下凸显的丰富图景与传播逻辑。

《观念、体制、话语：19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研究的三个视域》（朱天、吴信训，2012）用电视史论研究的方法，以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新闻改革为主体线索，对19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成果形成深刻影响的三

个关键领域——观念、体制、话语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了发现、清理、反思，其目的在于建立起当下视野中199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坐标系，并以此为参照，审视当下持续深化中的电视新闻改革的认识方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新的改革思路的构建与实践路径的选择，上述脉络也构成了该书的电视新闻史论研究及现实发展参照价值。

《21世纪跨文化英语广播电视新闻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研究系列：国际化新闻传播话语研究》（林海春，2014）系统分析在当今被称为“信息时代”里，呈现国际化“声像文”传播的大众媒体传播系统，对“符号化”语言体系的职业化运用本质，即：国际化新闻传播话语的特点、功能与作用。

《语类语境与新闻话语》（赵虹，2011）从语类与文化语境的视角对中美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2005年至2008年对十七起重大国际空难事件的第一时间新闻报道进行研究，目的是考察该语类的语域特征，探寻其语类结构潜势，分析该语类在两家报纸的表现差异及其原因，进而发现相关的新闻文化特征。

《跨学科视角的话语分析研究》（黑玉琴，2013）从不同学科研究的视角出发，对近几十年各个领域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设计、研究过程以及语料分析和解释等进行综述和研究，并提供细致、具体的研究实例。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对话语分析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从而不断探索话语分析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际价值。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辛斌，2005）主要介绍、评析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语言观和理论源泉等。批评理论的重点在于实践，力图把批评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对具体语篇的分析，以便验证其实用性和有效性。该书对批评语言学发展至今存在的问题和它所遭受的批评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和评论。

《话语文本：国家教育政策分析》（李刚，2009）选取教育政策文本及相关评论文本作为切入点，采用较为规范的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国家教育政策的形态和规律，书中所采用的文献编码统计法，符合科学规范，得到结果数据8000多个，书中丰富的注释和图表，以及有关国家教育政策传播特征的定量分析模型令人耳目一新。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谢立中，2009），认为“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最重要的社会学内涵之一就是试图否定作为全部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之基础的那种“给定实在论”传统，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话语建构论”立场来取代之。尽管这一立场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和诟病，但正如S. 塞德曼、R. 布朗、C. 勒麦特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它并非只是为我们修改、完善旧有的那些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提供了若干这样或那样的启发，而是蕴涵着一种与各种现代主义社会学研究框架很不相同的社会分析模式，即“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从而有可能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路径。在书中，作者试图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论述来说明这一基本观点。

《叙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模式（第2版）》（丁建新，2013）从以下几方面论述了社会符号学的模式：叙事与社会符号；主体间性、功能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社会符号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主体间性；功能进化论；社会生物学；话语、意识形态与控制；批评话语分析产生的理论背景；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基石；批评话语分析论述的三个基本问题；批评话语分析对语言教学的启示；体裁结构潜势、语义特征与词汇语法体现等。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形象：英国电视对话报道话语分析》（曹青、田海龙，2013）讨论了形象研究的理论及方法，重点探究电视纪录片叙事结构及分析模式，并以鸦片战争及儒学传统为例，解析英国电视片中建构的中华文明的总体形象；以国共冲突及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矛盾为主线，分析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形象；以《通向乐土之途》系列片为例，对历史纪录片做深入个案分析；最后将研究重点转向纪录片的话语策略及权力关系。

《教育公平的话语分析》（窦卫霖、顾明远，2014）运用话语分析的独特方法，对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比较研究。该研究以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为经，以国际组织和中美两国学术文本为纬，揭示了教育公平的国际进程、时代特色和中国特点。

《中国法庭审判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施光，2015）对中国法庭审判话语进行批评性分析。作者在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法庭审判话语分析三维框架，并运用该框架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八场法庭审判

近二十万字的录音转写语料。该书系统描述了法庭审判话语的形式结构特征，详尽阐释该话语生成、传播和接受的机制，深刻揭示该话语与法庭审判各诉讼主体（法官、公诉人、原告、被告等）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郑华（2013）的《首脑外交：中美领导人谈判的话语分析（1969—1972）》以美国新近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为支撑，以外交学研究中首脑外交的发展进程为结构框架，以1969—1972中美领导人谈判为研究个案，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话语分析方法解读中美关系解冻谈判的全过程。着重探讨：在外交关系解冻谈判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美高层领导人是如何运用有效的话语手段，构建并巩固自身的强势谈判地位，主导谈判议程，打压对方的。

《中国当代英文报话语分析》（马文丽，2011）在话语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构说了英文报话语框架，话语分析涉及两千多篇文本、多种新闻体裁，针对其政治、文化与语言等宏观语境，综合考察了中国英文报的历史沿革与现实话语样态，包括英文报在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跨文化传播方面的表现以及英语新闻写作与语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既符合中国对外传播政策，又符合国际新闻惯例的英文报对外传播策略。

《话语分析与中国高等教育变迁》（张灵芝，2015）采用话语分析的视角，从分析高等教育话语入手，从概念系统的变化理解高等教育的变化，考察高等教育是如何被“话”在“说”。通过对高等教育话语、话语实践机制分析以及它与权力关系的交叉机制等面相，帮助我们洞穿大学里的种种话语实践，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日常生活以及实践。

《“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孙吉胜，2015）系统对比研究国外的“中国崛起”话语与中国的“中国崛起”话语，发现二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契合，在哪些方面存在差异，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外的“中国话语”，以采取相应措施来改善国外的“中国话语”，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另外，近年来以话语的视角研究文化遗产已在国内悄然兴起。侯松、吴宗杰（2015）指出：文化遗产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话语实践，其中，批评话语分析（CDA）理论方法的跨学科推动作用是重要因素之一。他们致

力于引导中国 CDA 学者介入遗产话语研究，并借此探索具有历史文化厚度和本土批评精神的 CDA 文化路径。并提出以历史文本为主要资源，以反思当下为基本目标，以儒家话语批评智慧为路径导向的 CDA 研究，通过解读被全球化思维淹没了的历史声音，消解当下主流话语的权威性，促进多元文化话语的对话。

从以上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研究方法近十多年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成果层出不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话语研究的视角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如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等。

第四节 低碳话语的研究

本研究考察了 web of science 和国内的中文期刊网关于低碳经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近 20 年来曾上升趋势，这些研究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视角居多，学界纷纷从探讨新的经济模式、实现途径、立法等论题进行研究，而从话语的视角切入的研究凤毛麟角。

一、国内研究

近年来，中外有关“低碳经济”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比如单就文章而言，在中国知网上以“低碳经济”为主题词搜索，截至 2014 年 12 月 30 日，共 10208 篇，从数量上看，基本以 2009 年为界，从文献最早出现的 2005 年到 2009 年只有 264 篇，不到整个文献的 3%。之后则呈井喷式增长，尽管并非全为研究型文章，但数量也颇为可观，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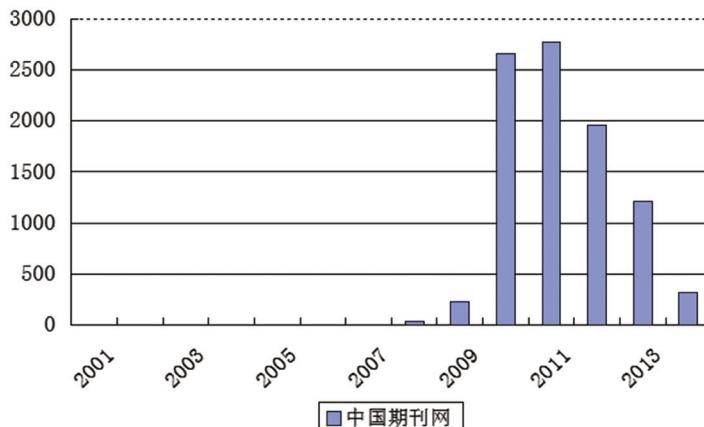


图 2.1 中国期刊网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文章分布

国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方面：

(一) 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

庄贵阳、陈迎（2001）从内部需求和外部驱动两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需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并对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和潜力进行了分析。提出未来中国要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低碳发展应该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调整产业结构、遏制奢侈消费、发展碳汇潜力、加强国际技术合作等途径。周宏春（2010）就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后我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段红霞（2010）认为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和安全的威胁促使我们转向低碳排放、低能源资源消耗、低污染和高产出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增长，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改善相互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人口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经济效率以及低碳和无碳能源技术革新，是驱动低碳经济转型和低碳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刘再起、陈春（2010）通过对全球 7 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日、德、法、英、俄、中）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方法（Cross-section SUR）对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的变系数不变截距模型进行实证

研究，研究表明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视国情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刘静暖、纪玉山（2010）建议应以自然力可持续利用为原则；创立气候自然力“第5要素”说；倡导低碳生产与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碳交易体系，推动碳减排合作；防范资本本性与“低碳经济”冲突的多途径转嫁。

许广月（2010）则提出发展低碳农业是走低碳经济之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明确发展低碳农业的路径选择，从而顺利实现由高碳农业向低碳农业转型的目标。王灿发、侯欣洁（2010）从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对出版低碳化的影响的角度，分析出版低碳化的路径，以及制约出版低碳化路径发展的相关因素。倪外、曾刚（2010）把低碳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研究低碳城市的发展路径重点分析低碳城市发展路径的核心内容，并以此判断上海市低碳城市建设水平，研究指出上海市低碳城市建设有一定基础，但处于起步阶段，低碳交通体系、低碳产业发展、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方面具有初步的基础，但城市低碳建筑、低碳能源消费、居民低碳消费，以及低碳管理与制度建设方面基本空白。

（二）对策和建议研究

孟德凯（2007）指出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和企业参与相结合、自主创新与对外合作相结合、近期需求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的原则，并采取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等市场机制、设立碳基金、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发挥碳汇潜力等对策。付允等（2008）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提出了我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即：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辛章平、张银太（2008）认为低碳城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说明低碳城市的构建途径：新能源技术应用、清洁技术应用、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和低碳消费，并阐述了低碳城市在中国的实践。任卫峰（2008）从环境金融的角度，总结了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经验，探

讨了环境金融创新的各种途径，并针对我国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三）内涵阐释

胡淙洋（2008）认为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低碳经济之路，是当今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张渝、陈徐梅、张跃军（2008）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密切关注的主题，研究结果表明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化石能源消费将持续增长，温室气体减排形势严峻。发展低碳经济刻不容缓，而技术进步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但技术瓶颈问题还长期存在。胡振宇（2009）对全球碳问题实质、碳减排政策制定。中国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认识过程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评价，指出中国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制定法律法规、强化统计体系、建立示范体系来推动碳减排工作，获取国际支持和认可并争取排放空间。郭万达、郑宇劼（2009）分析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指出：目前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发达国家纷纷将对低碳经济投资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抓手，低碳经济将是未来40年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中国应将发展低碳经济纳入国家战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谈判和有关国际标准的制定中。

（四）国外借鉴与启示

任力（2009）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这些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加强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型清洁能源；应用市场机制与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减碳；加强国际范围内的减碳协作等。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是：必须尽快提出低碳经济战略，建立起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与经营等。任奔、凌芳（2009）介绍了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

的成功经验，包括强制性法规标准、经济激励措施和发展碳交易等政策措施，同时介绍了在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碳捕存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最后，结合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启示。裘苏（2009）介绍了日本与中国台湾在低碳经济模式的探索的成功经验，并与浙江的低碳经济发展做了比较，从“自身发展特征”（人均GDP由6000美元突破至10000美元发展阶段的产业升级驱动力），和相应的“低碳经济策”（低碳技术、低碳行为、低碳制度）角度，提出了建设有浙江特色低碳经济之路的政策建言。田庆立（2009）分析了日本建设低碳社会的战略规划和理念，并介绍了日本政府通过立法和行业指导等方式，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运用财税政策进行鼓励和扶持的方式推动低碳经济健康发展，重视能源来源多元化，着力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这些举措对中国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富有诸多有益启示。刘志林、戴亦欣、董长贵、齐晔（2009）总结了英国和日本等国发展低碳城市的实践经验，并分析了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认为国内建设低碳城市必须走中国特色之路：发展和减碳结合、经济与社会并行、政-企-民共治。郭磊、马莉（2009）对2009年7月15日英国发布的低碳能源国家战略白皮书——《英国低碳转变计划》进行了深度的分析，着力介绍了电力工业的减排措施，从统一规划、智能电网建设、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完善配套机制等4个方面总结了对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启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周元春、邹骥（2009）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因素分解法（LMDI）定量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排放强度这几类影响碳排放的因素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程度。通过与其他几个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人口和排放强度都处于不利的阶段，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水平、提高能效、和改善能源结构方面下功夫。李伟、李航星（2009）探讨了英国碳预算的目标、模式、特征、作用及影响，指出碳预算将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英国制定和实施碳预算，意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建设，以便在国际气候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碳预算的借鉴意义不仅限于一国国内经济领域，而且关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五）困难与障碍

学界对目前发展低碳经济的困难和障碍展开了研究。庄贵阳（2009）分析了中国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趋势及影响因素，然后分析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障碍与困难，最后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研究表明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国内环境，避免技术和资本的锁定效应。任福兵、吴青芳、郭强（2010）从发展低碳社会的内涵和特点出发，按照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依据一定的方法和依据，建立了多层次多指标的低碳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Delphi 法确定各层次相关指标的权重，综合评价低碳社会的发展水平，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他们认为低碳社会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下产生的新型的发展方式，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必然趋势。

（六）发展模式探讨

王明杰、郑烨（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继工业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之后的又一次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将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还将引领科技继续发展。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如何改革传统营销模式，扭转当前市场营销所面临的困境，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立足低碳经济，探索符合这一时代要求的低碳营销模式，积极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消费者需求与环境利益的统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金乐琴、刘瑞（2009）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特定的制约因素，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潜在优势。中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建设性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在发展战略、政策机制、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做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准备。朱四海（2009）则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不能“闻鸡起舞”，一方面要避免经济发展的碳锁定，在低碳经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拥有话语权、掌握话语权，取得主动；另一方面要有效化解煤炭消费的碳约束，将煤炭主要用于发电，努力推进

电力绿化，发展绿色煤电和以煤电替代为主要内容的绿色电力。张鹏飞（2009）建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量居高不下的国家，需要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并在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刘啸（2010）以北京旅游为例，阐释了低碳旅游的理念，指出发展低碳旅游既可以为郊区旅游增加新内容，也可以明确努力方向、弥补生态旅游的不足。建议通过食住行来践行低碳技术，将低碳排放融入日常生活，既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也增加生态涵养区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全国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喻燕、卢新海（2010）建议将低碳房地产作为中国低碳经济的突破口，以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七）政策建议

姚晓芳、陈菁（2011）基于碳排放交易的内涵，结合欧美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经验，分析得出其对我国建设碳交易市场的启示，探讨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有效路径：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构建基于分权化管理模式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布局，完善碳排放交易法规制度，健全碳排放交易监管机制。罗宏斌（2010）阐述了低碳发展的相关概念，在总结发达国家低碳城市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明确政府在低碳城市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并系统提出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建议。刘兆征（2009）在分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从教育、经济、管理、技术、投入5个方面提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黄栋（2010）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关键手段。低碳技术创新的特点是包含了渐进性创新的突破性创新。政府政策在发达国家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我国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政策要点。刘美平（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本途径，英国、美国、日本主要发达国家分别通过低碳能源战略、低碳路径战略、低碳社会战略，应对气候问题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宣布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未来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需要实现信息化和清洁化；大力发展的城镇化需要实现现代化和生态化；同时，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产生的增长副产品如社会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安

全事故、道德失范等也需要清除。低碳经济引领下的工业化、城镇化之净化，增长副产品之清除，应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举措。范钰婷、李明忠（2010）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高碳特征的能源结构以及对外贸易的结构差异，导致中国在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压力。面对转型的挑战，中国需要从国家战略、优化能源结构、改造传统高碳产业、政策激励等四个方面出台支持措施。张淑谦、韩伯棠（2010年）针对我国风电产业发展的这种不正常现状，提出了以“干中学”为主的产业创新模式及风电产业有序发展对策，为低碳经济时代我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创新模式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二、国外研究

相对而言，国外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数量上不如国内。以其常用的英译 low carbon 为主题词，在西方大型社科人文文献库 Sage 中搜索，发现 227 篇，在大型综合性、多学科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中搜索，共有 123 篇，具体分布见下图：

这些研究大多在环境科学、地理学、法律、传播、公共管理、经济、贸易、气象科学等领域，和话语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共有 4 篇，他们分别为：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just transition’；Grassroots Localisation”；2) “The Scalar Potential of and Limits of the ‘Transition’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 and Resource Constraint”；3)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 the quest for low-carbon economic practices: A case of standard development in the food sector”；4) “Thoughts on Economic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Era of Post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这几篇文章都集中在 2011 年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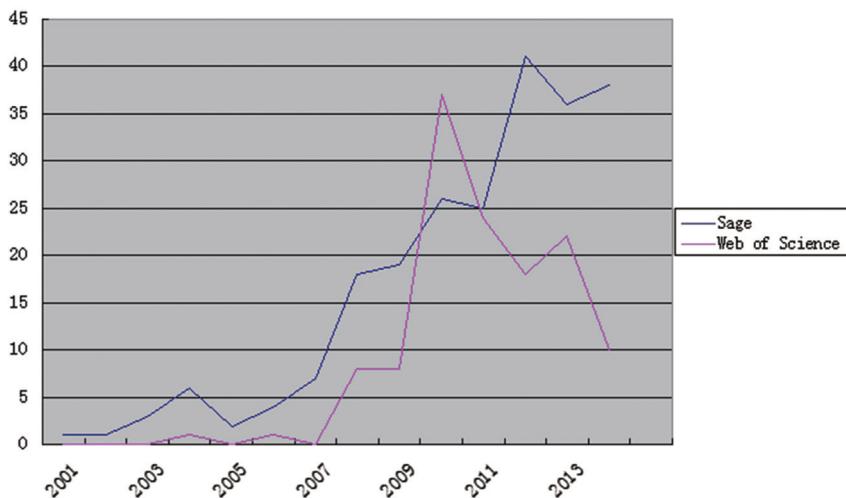


图 2.2 Web of Science 和 Sage 数据库中关于低碳经济文章分布图

纵观国外关于低碳经济话语的研究，我们又以“climate chang*” OR “climatic chang*” OR “climate variation” OR “climatic variation” OR “climatic evolution” OR “climate evolution”) and (“low carbon econom*” 为主题词对 SSCI、AHCI（艺术人文索引）、CPCI-SSH（社科人文会议索引）1900—2015 年间的文献进行检索，共发现 123 篇。最早一篇出现于 2006 年：“The politics and policy of energy system transformation — explaining the German diffusion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Jacobsson & Lauber, 2006)《能源政策》，文章呼吁推广再生能源发电的新技术，尽快向低碳经济过渡。文献主要分布在 2009 年以后，文献分布基本情况如下：

（一）低碳经济文献分布

1. 文献年代分布

从图 2.3 看，2004 年开始出现相关文献，2009 年前依稀可见相关研究，之后开始逐渐开始走上升的趋势，2010 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持续受到学界较大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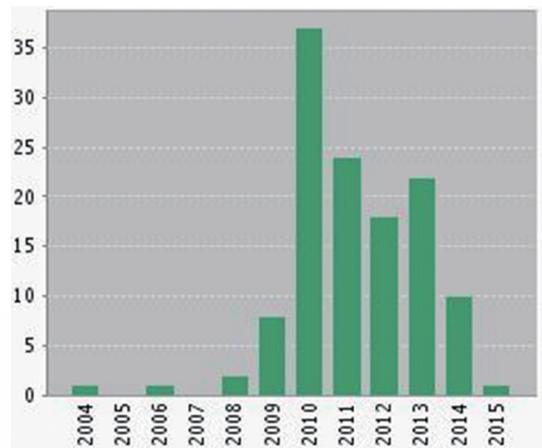


图 2.3 文献年代分布图

2. 国家或地区分布

从国家的分布情况看，中国、英国、美国三国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位居前三。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南非也有不少关注，还有瑞典、奥地利、法国、立陶宛、挪威、苏格兰、西班牙和台湾的学者加入低碳经济研究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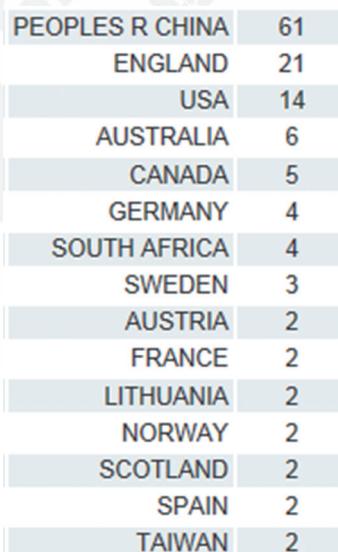


图 2.4 文献国家或地区分布图

3. 研究领域分布

从研究的领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环境科学、公共管理和能源燃料等学科。另外，社会科学、城市研究、工程学、管理科学、教育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关注，涉及的领域还有政府法律、计算机科学、大气科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和交通等学科。



图 2.5 研究领域分布

4. 载文期刊或会议分布

低碳经济研究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世界各地纷纷举办的相关国际研讨会，如 2010 年低碳经济与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2011 年低碳经济与可持续森林管理国际研讨会、2011 年教育科学和管理工程国际研讨会、2012 年管理创新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等。

ENERGY POLICY	11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W CARBON ECONOMY AND TECHNOLOGY SCIENCE	9
CLIMATE POLICY	6
PROCEEDINGS OF 201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LOW CARBON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FORESTRY MANAGEMENT	6
ADVANCES IN ASIA PACIFIC LOW CARBON ECONOMY	4
ENERGY ECONOMICS	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EBM2011 VOLS 1 6	3
URBANIZATION AND LAND RESERVATION RESEARCH	3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3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ESME 2011 VOLS 1 5	2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
CHINA WORLD ECONOMY	2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2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	2
PROCEEDINGS OF THE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ICMIPP 2012 VOLS 1 6	2
URBAN STUDIES	2

图 2.6 载文期刊或会议分布

5.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国内有山东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商业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国外的机构有：利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斯克气候研究中心、伦敦经济学院、开普敦大学、世界银行等。

SHANDONG UNIV TECHNOL	6
TSINGHUA UNIV	4
BEIJING JIAOTONG UNIV	3
BEIJING NORMAL UNIV	3
TIANJIN UNIV COMMERCE	3
UNIV LEEDS	3
UNIV LONDON LONDON SCH ECON POLIT SCI	3
BASQUE CTR CLIMATE CHANGE BC3	2
CENT S UNIV	2
CHINESE ACAD SOCIAL SCI	2
CIRED	2
FUDAN UNIV	2
LONDON SCH ECON	2
MERCATOR RES INST GLOBAL COMMONS CLIMATE CHANGE	2
PEKING UNIV	2
UNIV CAPE TOWN	2
UNIV SCI TECHNOL CHINA	2
WORLD BANK	2

图 2.7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二）低碳话语研究分布

我们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以不同的主题词进行检索：“低碳经济” + “话语”。检索式：“low carbon econom*” AND discourse，检索结果有 4 篇较相关文献，如：Kothari (2014) 通过分析马尔代夫的重新安置政策，探究对气候变化话语的政治观点。在马尔代夫，政府正在提议将分散在 200 个岛上的人口聚集在 10—15 个岛上，探究影响着关于气候变化和迁徙的讨论的必要面对政治责任，尤其是环境话语如何被动员起来以重新审视以前不受欢迎的重新安置和迁徙政策。

Koteyko *et al.* (2013) 提出一种至今没有受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框架——读者网上评论。他们通过观察词频、语境以及用户评价，分析气候门事件前和气候门事件之后发表于英国小报网站上的大量评论，发现“气候门”之后读者对气候科学的建构发生了改变。Sabet (2014) 对 BBC Radio 4 上展映的三个提倡在英国低碳生活方式亲环境行为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PEB) 活动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他指出，有关减缓气候变化政策不同框架的意义的话语争斗在政治界中以不同竞争和结合方式表述减缓气候变化政策，最常见的当属经济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有道德责任。尽管这个与生态现代化和绿色消费的话语有关的“双赢”建构在官方英国减缓气候变化政策上是最举足轻重的建构，亲环境行为促使行为上的变化。Nerlich *et al.* (2014) 探究关于从 80 年代至 2010 年地质工程宣传话语，研究这一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如何通过使用概念隐喻和话语隐喻被表征，如“地球是一个身体” (“THE PLANET IS A BODY”)、“地球是一个机器” (“THE PLANET IS A MACHINE”) 以及“地球是一个病人 / 瘾君子 (” THE PLANET IS A PATIENT/ADDICT”)。Crist (2007) 探究不同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她强调一些有关气候变化的话语可能影响的人们的观点。她提出关于气候变化的一种科学解释，同时她也解释与气候变化以及应对机制有关的事情。然后，她还指出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担当责任。Roelvink *et al.* (2011) 对 Weatherstone 农民关于环境退化话语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围绕着 Weatherstone 道德立场的生态关怀和生态责任。

(三) 气候变化话语分布

“气候变化+话语”；检索式：(“Climate chang*” OR “climatic chang*” OR “climate variation” OR “climatic variation” OR “climatic evolution” OR “climate evolution”) AND discourse，命中文献有 742 篇，文献分布基本情况：

1. 文献年代分布

关于气候变化的话语研究从 1992 年起就开始被关注，到 2006 年间陆陆续续有一些研究，直到 2006 年开始，每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可以见得，以话语为视角的气候变化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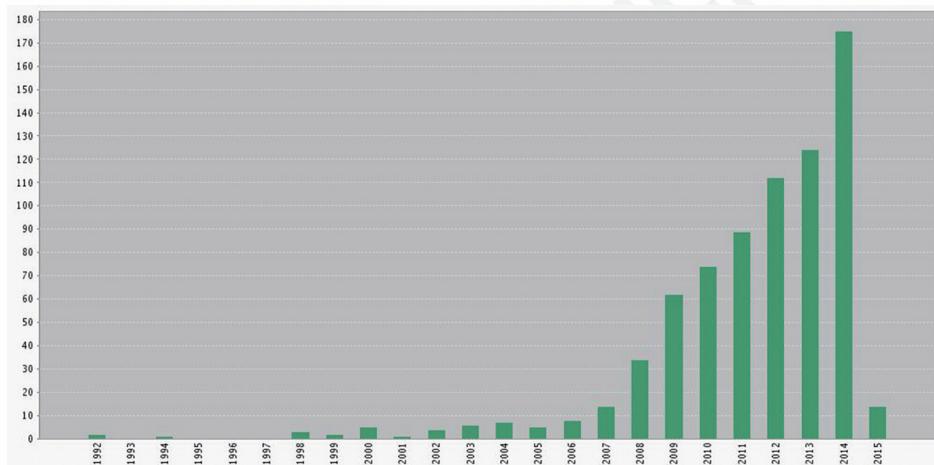


图 2.8 “气候变化+话语”文献年代分布

2. 国家或地区分布（5 篇以上）

从地区分布的情况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气候话语研究较为集中，另外还有挪威、芬兰、法国、丹麦、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匈牙利、南非、西班牙的学者，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印度、意大利、日本、中国也列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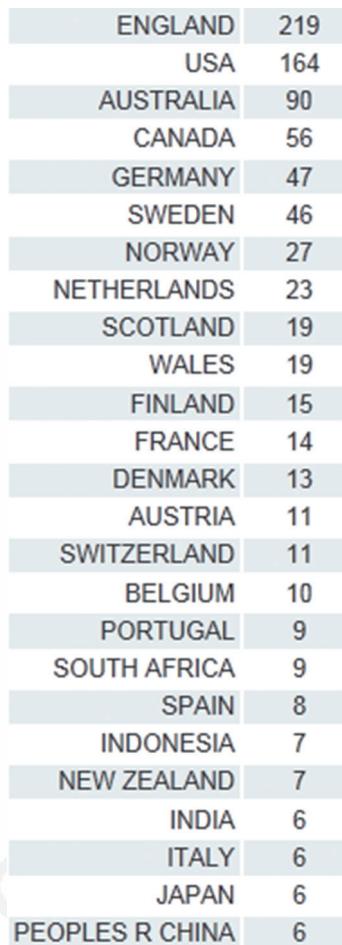


图 2.9 “气候变化 + 话语” 国家或地区分布

3. 研究领域 (5 篇以上)

这些研究分布面很广，涉及近 30 个学科，主要集中在：环境生态科学、地理学、政府法律、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大气科学、森林学、公共环境健康学、科学史学、数学、水资源；也有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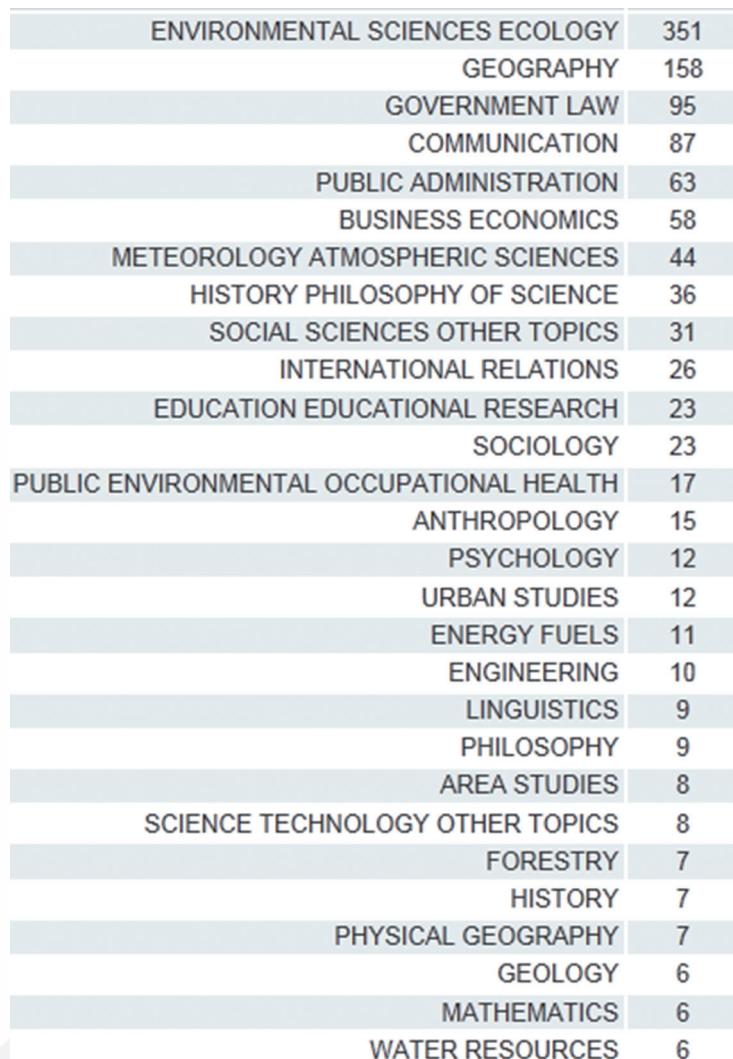


图 2.10 “气候变化 + 话语”研究领域分布

4. 期刊或会议分布（5篇以上）

相关的会议主题也涉及面很广，如：全球环境变化与政策、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环境政治、气候变化、气候政策、人文地理的进展、生态经济、能源政策、地理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政策与治理、风险分析、科学传播等。



图 2.11 “气候变化 + 话语” 期刊或会议分布

5. 机构（6 篇以上）

从研究机构的分布看，英国的高校居多，如东英格丽大学、牛津大学、诺丁汉大学、利兹大学、埃克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卡迪夫大学、曼城大学、杜伦大学、伦敦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兰卡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的卡尔顿大学、瑞典的乌普拉斯大学、新西兰的威灵顿大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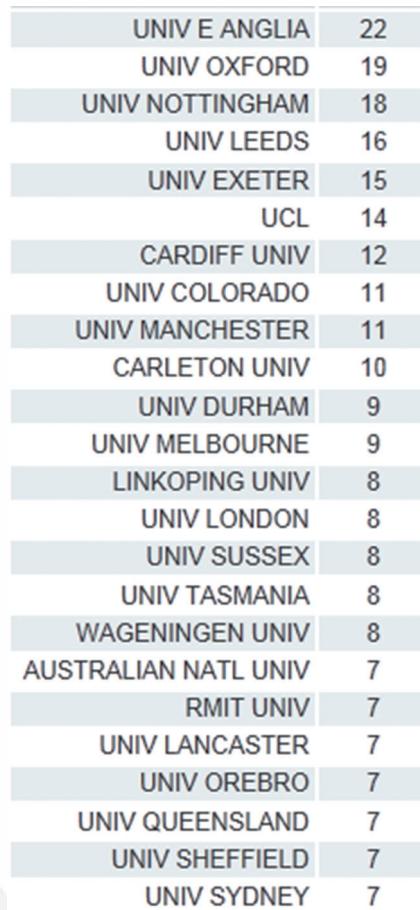


图 2.12 “气候变化 + 话语” 机构分布

6. 高频主题词分布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以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对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研究国内外尚无一例。本书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考察 2000 年以来中英美三国主流媒体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观察这些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本书所涵盖的报刊有中国《人民日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独立报》、《电讯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本研究结合批判话语分析和语料库方法分析中国、美国、英国主流报刊对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通过比较中国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进一步了

解世界发达国家政府关于低碳问题的政策取向，以及不同时期的话语嬗变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编号	频次	主题词	编号	频次	主题词
1	262	climate change	12	13	risk
2	62	discourse	13	13	vulnerability
3	38	adaptation	14	12	Migration
4	30	sustainability	15	11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5	29	discourse analysis	16	11	development
6	25	media	17	11	mitigation
7	21	framing	18	11	REDD
8	21	governance	19	11	Resilience
9	19	environment	20	11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	17	global warming	21	10	communication
11	13	climate policy	22	10	news media

图 2.13 “气候变化 + 话语” 高频主题词分布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话语与话语分析的定义，并对批判性与非批评性的话语研究方法进行了文献综述。对媒体语言的研究以及低碳经济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回顾，近年来从话语视角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以话语为纽带可以整合人文社科的各学科，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上的研究在大规模文本的处理上大多用人工阅读的方法，很少使用语料库技术。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成就了语料库语言学，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天地，正如 Leech (1992) 指出，语料库技术就像“芝麻开

门”一样开启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新思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多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语料库及语料库分析软件被大量运用于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被当作语言研究默认的工具（Teubert, 2005）。近年来西方尤其是英国许多学者开始将语料库方法和批判话语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到媒体话语研究中，下一章将讨论语料库的诸方法。